

姚丽娟
◎
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姚丽娟
◎ 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姚丽娟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30 - 3855 - 3

I. ①当… II. ①姚… III. ①社会—中国—文集 IV. ①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7159 号

内容提要

该书汇集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老、中、青三代教师的新近研究成果, 涵盖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研究方法也涉及定性和定量两大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些成果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家庭成员内部的一次学术聚会, 具体研究主题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分层、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群、民族政策、人口问题,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促进社会学与民族学及其人类学的跨学科交融具有典范意义。

责任编辑: 冯彤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装帧设计: 张革立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姚丽娟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邮编: 100088)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cb.tmall.com>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6

责编邮箱: fengtong@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29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0千字

定 价: 58.00元

ISBN 978-7-5130-3855-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中国古代哲学中蕴含强烈的轮回观，人们赋予时间以生命的意义，六十年为一甲子，三十年为一世，十二年为一周天。这样一来这些冰冷的数字符号背后承载了“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意涵。以这样的哲学观看，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发展也开启了一个新的轮回：中央民族大学开展广义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包含民族学、人类学等）已有63年的历史，狭义社会学（社会学）也走过了15年的历程。不论从哪个层面，我们都到了一个“一元复始”的发展境况。而如何能够实现“万象更新”，或许是每一个社会学人都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曾几何时，我们大师云集，学术至上，美美与共，包容和鸣，几代学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成熟、成人、成家与成名。如果非要找寻一种证据印证我们辉煌的理由，恐怕只能用“德艺双馨、多学科交融”来归结。其中德艺双馨，就是“人品要正、学问要好、学术要精”。多学科，就是“打破专业壁垒、跨学科交叉、兼收并蓄，互相融合，团结合作”。这些看似很简单朴实的做法，造就了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一度辉煌。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正在越来越偏离这种做法：我们追求学“术”，但不顾及品德修行；强调“竞争”，却忘记了“合作”；突出了“各美其美”，而弱化了“美人之美”。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醒思。我们有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他们正处于“为人、治学”的起步阶段，如果没有良好的品行，缺少既独立宽松又合作共融的治学环境，无论对于他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的学科发展来说，都没有益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年纪较长的学者，更需甘做人梯托俊彦，但求薪火有传人。

基于这样的关怀、抱负和指向，我们组织了老中青三代民社人，横跨社

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诸多学科，汇编了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们大家庭内部的学术聚会，它汇集了近几年作者在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此我们出版出来与大家共享。该书能够出版离不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鼎力支持，更离不开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老师们的无私贡献，在此一并致谢。最后，预祝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大家庭能够“薪火相传，蒸蒸日上”。

姚丽娟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2015年10月18日于文华楼

目 录

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演进与反思	1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研究状况内容分析报告	15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排斥反应	47
制度、行动与行动流	
——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化理论	65
公民社会构建与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走向	83
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	96
保安族的群体地位和个体流动	106
论语言冲突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123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	133
主体意识培育与撒拉族女性的发展：基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	143
维吾尔族族内互动与社会资本的维系	
——对维吾尔族社会“Qatar Chay”活动的解释	151
大学生自助旅游消费的社会学研究	160
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机制结构研究	
——以沈阳市城市老年人9年追踪数据为中心	166
民族餐馆从业人员消费方式研究	
——基于北京魏公村蒙餐馆的实地调查	177
破解“空心化”农村养老困境的对策初探	188
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	
——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	195
社会文化组织与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基于X村个案研究的讨论	208

人情社会与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建立	216
重复受灾地区的社会工作介入	
——以汶川县为例	229
对社会工作伦理中“案主自决”原则的阐述	246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政策的价值分析与社会分析	254
构建民族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框架	
——文化连续体、交叠共识与结构耦合	269
关于社区服务如何定性的思考	278
专业化、本土化、土生化与国际化	
——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走向	287
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之构想	298

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演进与反思

王旭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是组织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主题。然而，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演进脉络中，对于技术的讴歌、迎合和轻视、批判这两极一直并存甚至是针锋相对。^①那么，社会学研究者究竟如何讨论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又如何具体展开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本文将分别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演进角度，对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整体性反思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既有视角、分析框架。

一、国外研究的历史演进及视角转换

无疑，技术的社会性是技术社会学研究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长期以来，技术使社会发生变化与社会对技术进行塑造这一观点，却往往被假定为社会学考察与分析的前提性问题，没被纳入社会学应该直接参与的重要领域。总体而言，在国外，“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领域经历一个从抽象理论分析到经验研究、中层理论研究并重的转变过程，并呈现出从技术权变论到社会建构论、互动论的研究视角演进。同时，“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带动了大量研究者从社会组织角度分析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问题。

（一）早期研究

西方学者公认，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首先对技术进行了研究。

① [日] 仓桥重史. 技术社会学 [M]. 王秋菊, 陈凡,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1.

但在马克思之后，社会学家就很少涉足此领域了。客观而言，进入 20 世纪以后，技术活动逐步进入了社会体制化阶段，社会对技术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出现之前却很少有研究者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对于技术的理解几乎为技术决定论所垄断，以至于形成“技治主义”和“技术社会”思潮。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把技术仅仅看成科学的应用，研究者也主要在论述科学问题时附带性地谈到技术，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足以使技术的社会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实际上，一直到一系列《组织研究手册》公开出版，西方学者对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热情才逐渐提升。以经济学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除马克思、凡勃伦、熊彼特等人外，对技术变迁、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熊彼特等少数学者关于技术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基础之上，经济学家才开始系统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组织演进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样，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社会学乃至整个组织研究领域对于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也主要从宏观变迁角度看待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组织历史变迁的影响，强调现代技术的效率发挥必须借助科层组织形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①显然，韦伯等人早就对现代工业技术和科研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讨论，并认为科层组织结构是现代技术的内在特征。而工业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一些早期研究者则关注生产技术，尤其是一线操作技术对工作组织方式和工人行为模式及地位的影响。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组织结构”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从环境性变量（自变量）向因变量的转变，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才逐步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逐渐形成了“技术权变论”和“社会建构论”这两个研究传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布劳纳（Robert Blauner）的《异化和自由》以及伍德沃德的《工业组织：理论和实践》分别讨论现代技术对人和组织的“异化”、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在早期对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中，伍德沃德 1958 年的

① [美] 理查德·斯格特. 组织理论 [M]. 黄洋,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98.

研究 (Woodward, 1958) 和阿斯顿大学工业研究所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 经验性地探讨了技术对于组织结构和管理类型、特征的重要影响。而在笔者看来, 第一篇系统讨论技术和组织关系的学术作品却是汤普森和贝茨两人于 1957 年合写的《技术、组织和管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两位作者将技术和作业环境 (任务环境) 列为影响组织结构的两大因素, 印证了技术对组织结构、组织任务等级序列以及管理过程的影响。并从理论层面指出, 组织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 就越可能受到技术的约束, 在面对变革时, 组织结构的可选择空间也就越小。随后, 汤普森在他的《行动中的组织》一书中, 又提出以技术核心和边界扩展部门的二元分析框架对组织结构进行讨论, 可以在技术层次上清楚地理解组织的封闭系统特征, 在制度层次上理解组织的开放系统性质, 而管理层次的重要功能则在于勾连相对分离的技术和制度这两端。^① 基于这种系统结构观, 组织设计及组织实际运转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通过调整组织边界或者组织设计, 以保护其技术内核。

(二) 技术权变论和社会建构论

20 世纪中后期之后, 技术和组织的关系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 而新技术社会学对“技术的社会型塑”的强调, 也带动了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系统、行动者网络等研究路径的发展。后人对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两个研究传统的区分, 尽管有牵强之嫌, 但它们之间的争论焦点的确构成了这一阶段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重要线索, 也基本上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概貌。技术决定论认为, 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要素, 技术变迁会导致社会变迁。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本书采用更少决定论色彩的“技术权变论”和“社会建构论”指称这两个研究流派。

1. 技术权变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产业动态演变都受到其所应用的技术本质的深刻影响, 循着汤普森和伍德沃德所开拓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 大量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而首当其冲的, 正是“技术

^① [美] 詹姆斯·汤普森. 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M]. 敬义嘉,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6.

权变论”视角下的一系列经典研究。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技术权变论主导下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大多遵循帕森斯、汤普森的“三层次模型”（技术层、管理层和制度层），尽管他们并不断言或排除其他因素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但却明确指出技术是影响组织结构的最主要权变因素。

实际上，纵观有代表性的经验研究，一方面，“技术权变论”研究者强调技术自身属性、技术逻辑对于人类组织建构以及组织中人际关系的影响，从技术效率的角度讨论不同类型技术如何与特定的组织结构形式相对应；另一方面，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他们仅将技术视为影响组织变迁的众多因素中的一种，而并不否认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组织变迁。

如果对“技术权变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进行脉络性梳理，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技术权变论”的众多研究中，伍德沃德的经验研究最早指出技术是组织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组织的技术特征差异正好对应组织结构的现实多样性，并系统阐述了技术复杂性与管理层级、管理幅度、集权化程度等组织结构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①显然，在伍德沃德看来，绩效制约成了技术对组织结构要求的内在机制。另外，作为“技术权变论”的另一代表性人物，佩罗也明确提出了分析作为因变量的组织结构和作为自变量的技术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从四种技术类型、技术特征角度，对其对应性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类型化的分析。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技术权变论”经典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指明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技术特征与组织结构类型以及具体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然而，它们在结论上的差异却远比所达成的共识多得多。同时，由于相关研究者并不关心技术特征和组织结构之间对应关系的实际发生机制问题，对于同样技术条件下的组织结构多样性问题解释力匮乏。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界对单向“技术决定论”的批评日益增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修正技术决定论的技术社会理论模型。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应，也为新研究范式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2. 社会建构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新技术社会学”之称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

^① Woodward, Joa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London: H. M. S. O., 1958: 51.

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技术史和组织研究者认识到,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并不依照单纯的技术决定论或经济效率论逻辑,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再生产中自发生产出来的社会利益决定的^①。

与“技术权变论”相反,以平奇(Pinch)和比克(Bijker)为代表的一部分研究者将技术创新视为变异和社会行动者选择交替的演化过程,并主张从有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诠释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以及闭合机制(Closure Mechanism)这三个基本概念对技术进步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②。在此视角之下,研究者往往从技术的社会实践属性着眼,突出组织及其内外各类行动主体对于技术体系、技术应用的建构作用,强调技术选择、技术应用方式往往是出于社会控制功能或利益诉求,并关注技术属性如何在使用者的应用及建构过程中被改变。

社会建构论的探索更多地集中在微观和经验领域,但它最终偏离了哲学的方向而走向了技术社会学。在此背景下,许多研究者不满意以往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宽泛讨论,力图突破技术与社会的边界,从整体化型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促成新技术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成熟。然而实际上,社会建构论并不是通用某一研究范式的整体,而主要包含四种不同理论分析取向:第一种取向以英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着重从主观意义建构层面,分析某一技术的释义也就是意义是如何产生并保持一致的;第二种取向以(新)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为旗帜,重点分析劳方和资方在技术变迁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变动;第三种研究取向则是“战略选择”范式,研究者认为技术选择和应用方式取决于有选择权的决策者和使用者的社会背景及其“战略选择”过程;第四种研究则多从跨文化、跨地区、跨国家比较的研究视角,关注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社会政治条件对技术进步过程、新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

①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08.

② Pinch T. J. and W. E. Bijker, 198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i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 1984: 428 - 429.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知，“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思路突出了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在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社会行动者的诉求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控制或影响着对技术的认知、选择、应用方式及应用后果，进而形塑技术本身和技术进步的整个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建构论并不严格遵循所谓的“社会决定论”模型，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假定社会互动、社会利益是解释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唯一机制，只是在关系链条中，实际忽略或低估了另一端因素的重要性，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技术自身物质属性与技术效率逻辑的影响。

（三）“结构化”视角下的研究推进

如果综合回顾上述两个阶段的经典研究，就不难发现研究者提问方式的转换——从关注技术变革的后果是什么到探讨技术如何发挥其影响作用：“技术权变论”者强调组织要适应技术，主要回答的问题是组织结构对技术特征、技术结构要求的被动适应关系；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强调组织对技术的选择和制约作用，重点关注社会组织因素对技术选择和应用效果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两种分析思路都意图将技术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一方向的因果模型，未能明确指出技术和组织两者之间的实际关联机制，而对于两者之间非因果逻辑关系的探讨正是后续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契机。这种研究思路注定要饱受争议，亟待出现新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不断涌现，一方面促使研究者们更为关注革新、突生性等动态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领域的概念更新——革新（Innovation）、学习（Learning）以及突生（Emergence）等概念开始被采用。而信息技术科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则开始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中相互借鉴，并在研究框架上体现出了某些融合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概括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的整体状况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方面与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关，研究者以信息技术迅速扩散为契机，集中讨论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结构、组织绩效以及组织间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个方面以巴里（Barley）和奥利科夫斯基（Orlikowski）的“结

构化”理论为代表，研究者强调技术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所交叠形成的“二重性”（Duality），并从技术使用者、技术提供者在具体技术应用过程中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角度，关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问题。第三个方面则与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兴起和发展相关，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者关注企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及其构建机制，而核心能力的背后实际上则是组织的技术优势及组织制度创新。

在组织和组织关系研究领域，无论是权变技术论，还是社会建构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单向决定论分析逻辑。然而实际上，在这两类技术和组织关系单向视角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仍有很少一部分研究者试图同时从技术和组织（社会）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角度展开研究。社会—技术系统论因为其对社会和技术两种因素的同时强调，在双向互动论视角研究中很具代表性。通过已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社会—技术系统论者尝试从技术的组织（Technical organization）和工作的组织（Work organization）两个系统出发，展开研究。遗憾的是，虽然社会—技术系统论研究者将分析划分为工作系统、组织系统和宏观社会系统三个层次，但其研究却多集中在较为宏观的技术与社会关系层面，并且偏重通过技术系统的改变调整整个社会—技术系统，未能形成有效的双向互动分析框架和证据链条。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双向互动论”分析视角下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进展缓慢。

随着人类技术进步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将“结构化理论”分析框架扩展到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领域。总体上，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研究试图将技术、行动者和制度结构这三类要素融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三方互动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模型。而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则主要由巴厘和奥利科夫斯基两人完成。巴厘1986年以CT扫描仪在一家市区医院和一家郊区医院各自放射科的应用为例，分析了技术作为医院组织结构化诱因的“触发器”（Trigger）角色，并最终导致两者的组织结构变迁差异。而奥利科夫斯基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技术结构化模型（Structuration Models of Technology）。按照这一理论模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对行动者的结构性制约和行动者对技术的社会建构两个层面，提出了行动者、技术、组织的结构化（制度）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模型。而这种关系模型的建立则以技术的两个核心特征为基础：

技术二元性和诠释弹性。

总体上，如果说权变理论所关注的是正式组织的形式化、静态结构特征，那么，结构化取向研究所关注的则是组织参与者的行动结构和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①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不同特征的技术、不同的技术应用情景、不同的技术引入动机和诱因，都会导致差异性的技术应用过程及后果。基于此，对技术和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需要融合几方面因素——行动者的能动性和选择性、特定技术的物质特性和功能逻辑、技术应用环境，以突出和强调行为主体与技术之间的多元关系。^②

（四）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

在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领域，另外还有一类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技术创新研究。其虽然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源。这一类研究主要从技术创新角度，在组织变革理论基础上，研究技术发明、引进、扩散、应用和组织变迁之间的关系，重点讨论技术创新的组织机制，并分析技术创新的组织后果。一般而言，这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会将技术创新的影响内化为组织的岗位设置、部门结构和控制机制调整。而技术创新自身的范围也十分宽泛，包括设备、工艺、工作方式和操作流程等多种维度。^③

总体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技术创新研究一直集中于熊彼特的单一企业创新问题，其分析框架未有根本性改变，并且绝大多数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分析技术创新是源于“技术推动”还是“需求推动”。而且，在这一研究阶段，技术创新往往还包含一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意涵，而非单纯的技术进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技术创新和组织关系研究才出现突破性的变化，相关研究成果的类型和数量开始成倍增长。

在此背景下，研究学者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具体组织因素影响日益关注，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管理研究的快速发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① 张燕，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 [J]．社会学研究．2009（2）．

② Orlikowski, Wanda J. and Stephen R. Barley, 2001,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What Can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s Learn from Each Other? *MIS Quarterly* 25 (2): 145 - 165.

③ [美] 理查德·L. 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 [M]．王凤彬，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481．

就是把研究切入点放在企业间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间关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并区分技术创新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同时，另外一种常见的研究思路则是根据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讨论相应的组织方式调整问题。例如，有的研究者将技术创新的过程分解成发明、革新和扩散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则具有不同的创新机制和相应的组织架构。

从长远来说，在决定技术创新模式的诸多因素中，经济效率、效益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否认社会、政治或文化因素对于技术创新模式、过程及后果的影响^①，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大部分技术创新研究者看来，资本、技术和知识积累只有通过企业组织结构对其整合后才能够从企业内部直接贡献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活动。

总体而言，已有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关系研究，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的产生、采纳和传播过程，而且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问题，并不深入讨论新技术引入之后的具体技术应用和组织匹配过程，也较少讨论技术创新如何转化为组织的胜任力（Accountability）、核心技术能力和组织优势。另外，技术创新研究也比较容易忽视组织中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和建构作用。无疑，在当前的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关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从三者如何实现匹配关系和一体化过程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问题。

二、国内研究的整体概况和最新进展

（一）国内技术和组织研究的整体概况

正如国内学者邱泽奇所言：“国内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很多，但与组织变迁关联起来的文献却极少。”相对而言，社会学视角类的研究则更为有限，而且多从社会关系网络对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对于工人地位和利益影响的角度展开讨论。总体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新技术尤其是外来引进技术在产业集群或组织间的扩散过程及其后果。二是技术更替、技术进步对产

^① [美]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 [M]. 辛欣,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95.

业组织、产业内各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三是技术变迁、技术应用与组织成员行为模式、行动结构变动的关系。四是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问题，主要关心外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对组织自主技术创新过程及方式的影响。具体而言，国内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从大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来看，当前国内研究者对于技术和组织关系的讨论与以下几个主题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技术扩散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分工、产业结构调整；中外技术合作、合资企业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主要关注中方自主技术能力的实现及提升机制；信息技术扩散与应用，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应用与中国传统企业组织的生产效率提升、组织结构变迁、员工工作方式的相互影响；企业的研发机构建设和研发机制调整。

与以上主要研究热点相关，在国内的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中，一部分研究者把组织看作黑箱，在技术进步与组织效率、社会组织变迁之间建立线性关系模型。另一部分研究者虽然关注技术创新的组织环境和组织条件，但主要从宏观制度和技术环境层面展开讨论。例如，林毅夫认为，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产业经济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增长。

其次，从分析层次上看，国内相当多研究者主要是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例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产业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层面，讨论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大致而言，国内对技术在组织中具体应用过程的经验研究还较少，而且，技术和组织关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分析上，对于一般性生产技术的关注较少。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从行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层次，研究技术变革与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比如，讨论汽车工业技术变迁和汽车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最后，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尤其重视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背景着手，讨论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组织关系问题。这类研究既强调宏观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调整过程的根本性影响，也认为与效率提升幅度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制度逻辑约束下分配技术进步收益，实现相关方的普遍受惠。